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〇编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胡 风 著

華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胡风代表作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唐文一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胡风代表作：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 胡风著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胡… II. ①胡…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591 号

胡风

多少年
长年了

我以前
在延安
和朱德
一起过

我们那时
住在窑洞里
和敌人打过仗

那时
延安的
人民过

我们那时
住在窑洞里
和敌人打过仗

那时
延安的
人民过

胡风手迹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 30 年左右。30 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 30 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 108 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 1. 19

胡 风 小 传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1902年11月1日出生在湖北蕲春县赤东乡中窑村一个以经营面食业为主的普通农民家庭。取名为张名桢,后改学名为张光人。

1912年进私塾启蒙。上中学时开始接触新文学运动,试用白话文写诗。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25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1929年赴日本留学,结识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33年6月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先后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1934年冬以胡风的笔名开始了作家生涯,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文章。1936年在鲁迅的倡议和支持下,编辑出版《海燕》等进步文艺刊物。同时在鲁迅、冯雪峰的授意下,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起主张“国防文学”的作家的异议,由此展开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战期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部主任,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在当时进步青年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

全国解放后,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1954年因向中共中央上书《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而受到批判,并于1955年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首犯,被捕入狱。监禁期间,抱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友人的思念,写下了大量的诗文。1980年平反后,任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顾问、中国作协顾问,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并不顾体弱多病全力投入写作,写出了近70万字的回忆录、散文和杂文,记述了大量重要的文艺史实,并对自己的文学道路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1985年6月8日因患贲门癌,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目 录

胡风小传	1
文艺理论	
林语堂论.....	3
张天翼论	18
翻译工作与《译文》	38
现实主义的一“修正”	50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58
略论文学无门	60
吹芦笛的诗人	63
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	69
文学上的五四	78
论民族形式问题	80
关于“诗的形象化”	125
人生·文艺·文艺批评.....	131
天才.....	136
青春的诗.....	137
论现实主义的路.....	141

诗 歌

儿时的湖山	203
赠 S	205
我从田间来	207
给死者	209
风沙中	211
旅途	213
给——	215
闷	217
心儿病了	218
虽然不是爱人	219
献给大哥	221
野火	224
冬之三部曲	225
寒夜	228
废墟上的春天	230
幻灭之歌	231
夕阳之歌	235
武藏野之歌	237
为祖国而歌	239
血誓	242
海路历程	245

杂 文

作家与草莓	255
战争与和平	257
辩证法与江湖诀	259
《过去的幽灵》	260
蔼理斯·法朗士·时代	262
流氓哲学	264

存文	266
把目光放到“战壕”以外	268
冬夜通信	270
由“人性”到“互利”	274
写在昏倦里	276
断章	280
棘源村断想	282
棘源村断想(其二)	286
致反法西斯的敬礼	288
胡风主要著作书目	291

文艺理论

林语堂论

——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一个视角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一年以前罢，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论语》。那里面有一封仰卧在草地上架起脚来读《论语》的大学生寄来的信，写着他对于《论语》的意见。编者对于他的回答是，来信所陈，无一是处，唯读《论语》之姿势可取（大意）。这个回答是非常“幽默”的，从这里可以依稀地想象到这个刊物所要得到的是怎样的读者。然而，像这一类的资料在《论语》里面一定不少罢，《论语文选》的正文前面就有题为《反对论语者之溃灭》的由六幅合成的连环图画：

一、一桌麻将牌“三人差一”，所差的一位正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哈哈大笑地读着《论语》；

二、三人之一的西装青年起身去看了；

三、摩登女子也起身去看了，只剩下戴瓜皮小帽的胖子抱头着急；

四、胖子站起来走拢去；

五、胖子也站在那后面看；

六、一同哈哈大笑。

但实际上《论语》的反对者并不是完全“溃灭”了的。除了那些打通电的“文学家”们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来。不久以前，在一个比较开明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涉及《论语》及其“姊妹刊物”《人间世》的文章：作者提到有一个叫做山内地方的住民，因为隔水太远，只吃得到咸鱼，由这就养成了爱吃咸鱼肚的习惯；鱼肚是最臭的东西，但那地方的人却觉得愈臭的鱼肚就愈好，《论语》、《人间世》的读者，不过是爱吃咸鱼肚的山内人罢了。

当然，这都是极端的例子，但《论语》及其姊妹刊物《人间世》广泛地走进了读者社会，同时也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批判，却是事实。而这些批判又常常是集中在这两个刊物的创办者兼主编者林语堂氏的身上。为什么成了这样的呢？这是因为这两个刊物的存在与成长和林氏在学术界的经历与地位有不可分的关系的缘故；这是因为《论语》的“幽默”和《人间世》的“小品文”都是在林氏的独特的解释之下被提倡被随和了的，都是沿着林氏的解释而发展了的缘故。

所以，当我们研究林语堂氏的业绩的时候，是不能不牵涉到《论语》和《人间

世》的影响的评价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要究明的主题(theme)并不是他在言语学上音韵学上的成就,在那里面也许找得出来他对于中国学术的有用的贡献,也不是他在外国语文教学方面所树立的功绩,而是想说明,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化人,他的“处世”态度的变迁表现了什么意义,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学见解,客观上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

……其景况适为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带油腔滑调,然亦未尝不嬉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吾集天下纵谈之友于一室,半月一次,使天下窃闻我之纵谈,是办《论语》之意义也。(《与陶亢德书》,《我的话》四二页)

他的黄金时代

在这里,让我们和林氏一起回忆一下他的“浮躁凌厉”的时代罢。

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剪拂集》多少是反映了林氏个人的那个时代的,在《序》里,他用了不胜今昔之感的笔调叙述了他的回忆:

……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梗。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龄的不是,只能怪时间与自己。一是环境使然,在这……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

在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两年前“革命政府”时代的北京,真使我们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与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德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悲壮!国务院前哔剥的枪声,东四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舁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会,这是何等激昂!……在当日,却老老实实不知堕了多少青年的眼泪,激动多少青年的热血,使青年开过几次的追悼会,做过几对挽联,及拟过多少纪念碑的计划。

不用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阶段。虽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下面,但无疑地林氏是站在那个阶段的大潮中间的。从这薄薄的一本《剪拂集》里面,可以举出一些

例子来描写当时的他的“战斗的”姿态。

第一是对于投身在北京政府下面的学者的斗争。当时的北京学术界，显然地分成了两大营垒，一部分凭借了现有的势力，一部分却和南方革命怒潮中的民主势力相呼应。林氏的态度主要地是被后面这个阵营的战略所决定的。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是他们的面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的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乎？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面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脚，木腿来了。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结果必以自身为重于特别教门。（《祝土匪》，《剪拂集》二——三页）

这种学者，“一方面讲革命，一方面正在与旧势力妥洽”（《剪拂集》九六页），“今日为帝国主义作宣传者乃知识阶级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数是比较新派的人物，即所谓出过洋，念过洋文的人”（同上，一二一页）。他把这些叫做“文妖”，要发动一个“打狗运动”，把他们“肃清一下”。

第二是主张欧化，反对国粹主义。投身于现成势力的学者们，在思想上当然是当时以《甲寅》为首的复古势力的支持者。林氏曾提出“足以针砭吾民族昏愦，卑怯，颓丧，傲惰之痼疾”的六个条件：

一、非中庸（即反对“永不生气”也）。

二、非乐天知命（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

三、不让主义（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只要能够觉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讨求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锄耙冲打出去而已，未尝厉兵秣马以为之也）。

四、不悲观。

五、不怕洋习气。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孔丘之国粹当然

非吾所应有，然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摒弃之列，最好还是大家穿中山式之洋服。

六、必谈政治。所谓政治者，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干忽而揪辫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谓在社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

第三是所谓“性之改造”。对于有“少不更事的勇气”的林氏，当时阴沉的北方社会情势是不能够使他满足的。他把这原因归在中国人的“性癖”上面。

……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惰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容易。中国今日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生命之人则不可得……（《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剪拂集》一六——一七页）

因而他主张骂人的必要，“……愈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以为该骂的对象愈多，有感到骂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时感到骂人的神圣。”（《论语丝文体》，《剪拂集》七七页）

第四是对于民众的力量的肯定。由“五卅”所掀起的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对于那运动的中心动力，绅士阶级不肯也不能给以估价。和他们的代言人之一的丁在君相对，林氏是站在“民众”方面的。

……若是不明白这回运动的真正意义的人，若丁先生与其同辈，不明白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就跟他讲的焦唇烂舌，也是无用。我辈所希望者在民众，丁先生所期望者在外交官僚，两方面的意见相差太远，所谓融和意见，我敢谓是决难办到的事。（《丁在君的高调》，《剪拂集》二〇页）

第五是……

以上的引用和说明，并不是以为这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进步的阵营的特色，也不是因为在思想斗争过程中有了什么大的影响，而是因为，在林氏个人的经历上，那是一个发芽吐叶的时期，沾到了时代雨露的润泽，吸收了社会生活的营养。没有那个时期，林氏的经历也许取了比较更不同的面貌，尤其重要的是，没有了那个时期，现在的林氏就不会有自信对于办《论语》、《人间世》和提倡语录体的他自己还